

第一章

长征的序幕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于 1927 年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的大旗，率领广大群众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支红军和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政权，革命烈火重新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为了消灭蓬勃发展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从 1930 年底开始接连发动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但均被英勇的红军所粉碎。

恰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并一步步向关内进逼，民族革命的高潮逐步在全国兴起。可是，蒋介石竟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集中力量“围剿”各个革命根据地。在他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被红军打破以后，又于 1933 年 9 月，以 100 万军队、200 多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最大的一次“围剿”——第五次“围剿”。

这时，在几块大的革命根据地中，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已受到较大的损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已向西转移，在川陕边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二军团，已改编为红三军，在湘鄂川边流动游击。惟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损失不大。因此，蒋介石这次“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消灭中央红军，他集中了 50 万兵力，并把驻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军，再加上第十九路军，集中“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与之相邻近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其部署是：

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下辖三路军，共 33 个师又 3 个旅，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其任务是：向广昌方向筑垒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 11 个师又 1 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

第十九路军等部共 6 个师又 2 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 5 个师又 4 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湘军 9 个师又 3 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相机东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在政治上，他继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主武装建设，强化其反动统治。在军事上，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①等原则，并且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改编部队，举办军官训练团，普遍构筑堡垒封锁线等，企图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聚而歼之。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与此同时，对外加紧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对内肆意进行横征暴敛，筹措“剿共”经费，购买飞机、大炮等，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已发展至 8 万多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

1933 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

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二）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7 年版，第 241 页。

到了进一步贯彻。在政治上，他们看不到自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规模侵略中国以来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不懂得应该迅速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击主要的敌人，反而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否认敌强我弱的客观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实行“进攻路线”。在军事上，他们抛弃了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如集中兵力、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等等，采取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主张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组织上，他们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对坚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控制了各级党政、军大权。为了排除阻力，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他们首先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①的斗争，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这年 10 月初，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上过前线，并在巴伐利亚参加革命军队。

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曾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曾任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他们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了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所以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

1919年4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0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后来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他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和在苏联得到的训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却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把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那么，他是怎么指挥的呢？当时给他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①，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

当时中央无总书记职务，博古是临时中央负责人。

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路线。^①

当时，中共临时中央为了照顾李德的生活，在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一公里处，给他建了一所独立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在这所“独立房子”的指挥下，红军的反“围剿”战斗只能越来越不利。

从9月25日开始，国民党北路军的3个师首先向黎川发动进攻。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十

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分重要，由闽赣军区部队防守。但是，由于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到外地作战，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个 70 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在国民党军向黎川进攻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犯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毛泽东亦认为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加以各个歼灭。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丢失一寸土地。不得已，萧劲光只好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城外。28 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并加紧构筑工事，企图迅速完成其堡垒封锁线。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就红一方面军新的作战部署问题接连致电中革军委和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并建议待红三军团等部集中后，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占领黎川之敌；主力突击敌之侧背。^①然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察敌情的变化，拒不采纳周、朱的正确建议，而急于收复黎川，一味命令红一方面军在敌堡垒之间进行冒险进攻。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红一方面军从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先后进行了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等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收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伤亡，致

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2 页。

使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作战失利。

对于红军作战的失利，博古、李德不是认真吸取教训，改变冒险主义的做法，而是丝毫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军内，提出要“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首当其冲的，便是撤出黎川的萧劲光。博古、李德主张对他进行审判，判五年徒刑，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反对下，才取消了这种判决。对此，萧劲光回忆说：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时，由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我进行了公审。参加者有红军各部队，中央一级及各后方机关的代表。主席宣布开庭后，由书记读起诉书。起诉书以黎川失守为主题，……公审结束，开除党籍和军籍，判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公审判决以后，我被关押起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派贺子珍同志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的对。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后来我听说在决定处罚我时，有的人主张杀掉我，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王稼祥同志几次拒绝签字。我被关了一个月后，在二月初的一天，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到“红大”当教员。可以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

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的保护，在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根本不会留下我这个“罪犯”，很可能杀掉了。我是一个幸存者。当时，多少好同志受打击，多少好同志被错杀啊！^①

当时，红军还失掉了一次打破敌人“围剿”的十分有利的机会。1933年11月20日，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分由江西、浙江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中央苏区的东面、北面压力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面对这种有利的形势，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三、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

①《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142页。

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①。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为十九路军的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与十九路军在军事上进行配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的正确建议。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博古、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于 1934 年 1 月很快失败，蒋介石又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次大好机会。

对于当时的情况，朱德后来回忆说：

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236 页。

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①

当时，红一方面军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决定以红五、红七军团及独立第六十一团等编为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和消耗东线之敌；红九军团及独立第一、第四团编为中央军，在红五军团左侧钳制和消耗敌人；红一、红三军团及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编为西方军，转移到江西永丰地区消灭敌税警团，并相机消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三、第二十七、第十三师等部队。12月22日，红一军团开始西移。

永丰地区堡垒林立，国民党军防守十分严密，已形成了完整的火力封锁网，特别是税警团一部和第九十三师防守的藤田至永丰之线，构筑碉堡共230座，平均2公里左右一座，火力配系比较周密。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无视这种不利情况，要求西方军按照李德提出的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术，实行硬性进攻。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西方军（欠红三军团）开始向永丰以南的丁毛山堡垒阵地发动进攻，企图消灭敌第九十三师。但是，由于红军缺乏重武器，不但无法消灭龟缩在堡垒内的国民党军，反而在国民党军的强大火力射击下，部队遭受较大伤亡，被迫于1934年1月4日黄昏撤出战斗，西进永丰地区的反攻计划化为泡影。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西进之机，步步进逼，不

朱德自传，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仅限制了东方军的活动，中央苏区的翼侧也受到敌军的威胁。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临时中央为保卫中央苏区的翼侧安全，于 1 月 2 日命令“第三军团明三号开始向沙县地域移动，并应于十号协同第七军团遂行进攻卢兴邦旅（此处有误，应为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十二师——引者注）及占领沙县”^{94①}。

沙县城是闽中的重镇，由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和地主武装共约两个团的兵力凭坚固守。11 日，红三军团开始包围沙县城。12 日，发起攻城战斗。由于城墙高而厚，加上国民党军的强大火力压制，攻击受挫，改取坑道爆破。25 日，红三军团攻城部队引爆了沙县城西门坑道内的炸药，将城墙炸开 20 余米长的缺口，红军乘机攻入城内。经三个小时激战，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少数部队也纷纷投降。至此，红三军团胜利攻占沙县城。这是红三军团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取得的第二个胜仗，共毙伤敌 700 余人，俘 1300 余人。红三军团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台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蒋介石火速增援。从 26 日至 27 日，蒋介石派飞机连续空投了大量的弹药、布匹、钞票等，均为红军所获。这些物资，对于缓解中央苏区物资供应困难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仅是一个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扭转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

1934 年 1 月中旬，在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

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 430 页。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 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和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 并设立中央书记处，亦称常务委员会，当时在中央苏区的书记有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另外还有在苏联的王明和在川陕苏区的张国焘。这次全会是“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顶点。在军事指挥上，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指挥。2月3日 中革军委进行了局部调整，朱德仍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指挥权仍把持在博古、李德的手中。

1月下旬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 重新调整了其“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以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下辖第二、第五路军和总预备队，共16个师又1个旅、2个团；北路军下辖第一、第三、第六、第二十、第二十六路军和总预备队，共25个师又2个旅、1个支队和3个团。然后，即命东、北两路军重新向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从此 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最困难的时期，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

4月初 蒋介石按照既定的“会师赣南”计划 命令北路军、东路军协力“进剿”广昌、建宁 南路军攻取筠门岭 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的行动；空军第三队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的作战。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首先向广

昌发动了进攻。

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和减员很大等情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从福建建宁地区迅速回师江西，会同新从龙冈地区调来的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

4月10日6时国民党军开始向广昌实施进攻。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坚守盱江东岸大罗山、连福峰、白叶堡阵地，抗击敌河东纵队；红九军团和新从龙冈地区调来的第二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红三军团第五师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号召，依托阵地，向进攻之敌实施“短促突击”，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歼敌第三十三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官兵120余人。鉴于其河东纵队受阻，陈诚即改取以河东纵队在盱江东岸钳制中央红军主力，河西纵队向前推进。但是，博古、李德不察敌情的变化，仍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坚守河东阵地，与敌对峙。

4月27日，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广昌。不到半天，便把李德所谓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轰平了，守备在工事里面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众敌夹击下经过一天激战，发动了多次突击，均未成功，受到很大伤亡。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退出广昌。至此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此役，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

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尔后红军的反“围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彭德怀在战役结束不久，当面批评了李德的指挥。他在回忆广昌战役和这段经历时说：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

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9～191 页。

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曾支持“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也开始对李德的指挥不满。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张闻天对李德的错误指挥已经开始怀疑。广昌战役后，张闻天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吗？在5月上旬的一次中革军委会议上，他批评广昌战役说：这次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结果使红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并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结果与博古发生了激烈争论，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一九〇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①

当时，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满意李德的错误指挥。后来，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他竟一脚把锅给踢翻了。刘伯承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结果被降到红五军团去当参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